

## 天真的和感傷的研究者

施海淑 廣西大學講師

2009年，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先生應邀在哈佛大學那個擁有很高學術聲譽的諾頓講座做了為數六期的演講。他將這一系列的演講命名為“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這個題目顯然有著借鑒席勒的《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的痕跡。但帕慕克與席勒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帕慕克，這位有著超過35年的寫作經驗（可以想見，閱讀的經驗還會更長）、寫出了《純真博物館》那樣的小說、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在第一講中，不僅區分出了“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更指出：一本好的小說、一位好的小說家以及一位好的小說讀者，總是會在“天真”和“感傷”之間矛盾糾纏、漂浮移動。而小說的魅力，也正是在這樣矛盾糾纏、漂浮移動的過程當中顯現、被發現的。如果我們同意帕慕克的觀點，那麼我們就將面臨一個亟須探討的問題：我們將如何在“天真”和“感傷”之間漂浮移動呢？

王明珂老師在充滿思辨的報告中，以三種文本——當時的記錄者稱之為“歷史”、“傳說”和“神話”——對同一個土司家族起源的記錄作為表徵，移動著“考察的凹凸透鏡”——“歷史心性”，揭示出其背後的“本相”：它們反映著講述者將“土司”置於“中國政治與權威的邊緣”，還是“藏傳佛教文化政治圈的邊緣”，還是“川西漢人與中原漢人之邊緣”的意識。王德威老師以陝西作為聚焦，以“現代性”作為錨點，以宏觀勾勒和局部細描相結合的方式，考察從“易俗社”戲劇開始，到“延安文學”，到“西北風”，到“陝軍東征”，到晚近寧夏、青海、新疆甚至包括到駱以軍的《西夏旅館》的異彩紛呈的“西北文學”，展示了“西北文學”多元而流動的特質：“‘西北’不僅是一個地理所在，也是（流動的）人文、政治的物質空間，更是想像、言說、辯證的歷史場域。……文學所指不止限於紙上文章，也是具有社會意義的象徵活動。因此從文學角度而言，‘西北’既是一種歷史的經驗累積，也是一種文化的‘感覺結構’”。田曉菲老師從不同文類的精怪故事的“人們”處理“故物”的“燒”或“埋”的方式挖掘出其背後蘊藏的與此前的魏晉南北朝不同的中唐時期人與物之間關係的轉型。正好與王德威老師的觀點（“文學所指不止限於紙上文章，也是具有社會意義的象徵活動。”）遙相呼應。李貞德老師仔細比對陳延之《小品方》（“女子年十六以上則有月病”）和兩個不同版本的《千金方》（《備急千金要方》：“經言婦人者……十四已上陰氣浮溢……”《孫真人千金方》：“經言婦人者……十五歲已上陰氣浮溢……”）對婦人月病的記述，揭示出一字之差所折射出來的古人對婦人的身體觀，以至勾連出背後複雜而深邃的宇宙觀。榮新江老師則提醒我們，把廣泛流行的、似乎已經成為某種慣例的

“南北”視角換成“東西”視角之後，我們將對唐長安城以及在這座城市中出現和生長的文學、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等的風貌獲得不一樣的認識；也將可以對唐時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人們，包括所謂“胡人”等外國人，獲得更多的認識。

如果說老師們的講座總不免歷時的線性陳述的話，那麼田野考察時的所見，則是許多異質因素的共時呈現。

我們該如何探究岐山周公殿、姜嫄祠、郊禘殿和玄武洞同時並置於周公廟中的現象呢？又該如何解釋出現在固原博物館中那尊具有明顯薩珊風格、繪製著“特洛伊戰爭”的三個情節——“帕里斯審判”、“海倫私奔”和“迎回海倫”——的鎏金銀壺呢？又該如何看待須彌山前那個想要講述須彌山的故事卻又複製了大量敦煌莫高窟壁畫的博物館呢？正如我們曾經努力在各位老師歷時性的表述中希圖發現某些共時性的因子一樣，我們將如何在這些共時呈現的異質因素中發現其歷時性的變化，從而更加接近它們的“本相”呢？

研習營的講座和田野考察讓我深深地意識到：不僅領悟小說的魅力需要漂浮移動，研究也同樣需要漂浮移動。並且，更重要的是，還要找到合適的漂浮移動的載體——“凹凸透鏡”或者“聚焦”或者其它的中介：譬如王明珂老師的“歷史心性”，譬如王德威老師收狹或者擴大的視野，譬如李貞德老師不同的“版本”，譬如榮新江老師轉換的視角……

究竟怎樣的研究者，才是又“天真”又“感傷”的研究者呢？